

“人道的”干预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新“克林顿主义”

范士明

自乔治·华盛顿始,美国的对外政策史上留下了各种各样的“主义”。远的不说,“二战”以后的几乎每个总统,都留下了自己的主义,如“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尼克松主义”、“卡特主义”、“里根主义”等等。所以美国人自己也说“各种主义是美国的特产”。现在,又有了“克林顿主义”。和前述的各种“主义”类似,“克林顿主义”是记者和学者们为克林顿的一些对外政策主张贴上的标签,其含义颇值得澄清。我们讨论“克林顿主义”,需要解答的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克林顿主义”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从何处来,将向何处去?在国内的“克林顿主义”(Clintonism)和在海外的“克林顿主义”(Clinton Doctrine)有什么联系?克林顿的“主义”又与其前任们的“主义”有何关系?如果不把“克林顿主义”横向纳入美国90年代整体内外政治环境,而又切断其与美国对外政策史的纵向关系,那么我们得到的就会是一个“干巴巴”的“克林顿主义”,而美国的对外政策史恐将变成由各种“主义”组成的字典。

“克林顿主义”在海外

美国人若干年前就开始使用“克林顿主

义”(Clintonism)一词。克林顿就任总统前后,这个词用来概括他的各种竞选主张,特别是他在国内问题上的主张。克林顿声称他要“象激光束一样”把注意力对准国内经济,并且在上任前两年力图实现自己的诺言,而把对外政策置于国内政治之下。因此,有人认为克林顿只是在某些对外问题上(如支持俄罗斯民主成果、鼓励阿以和谈、促进北美自由贸易区)延续布什的政策,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如对华关系)干脆没有明晰的政策。重视对外政策的人还批评克林顿过于奉行“国内第一”的路线,以致于在对外政策上犹豫不决,摇摆不定,政出多门,缺乏连贯性,搞得与多个国家关系紧张。^[1]因此,克林顿第一任期的“克林顿主义”这个词,基本不包括他的对外政策方面;如果包括,也是指其国内优先,而在海外没有“主义”的“克林顿主义”。

在克林顿执政的中期(即第一任期后期到第二任期前期),由于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克林顿政府的一系列对内经济、社会政策措施引起讨论。克林顿作为民主党总统,其政策措施却吸收了若干原属于共和党人的主张,在处理国内棘手的医疗福利改革、预算平衡、肯定性行动计划等等问题上,综合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思想,因此被称为走“中

· 作者感谢刘金质老师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间派道路”、“第三条道路”的新民主党人。但是，这时对“克林顿主义”的讨论很少触及其对外政策。可以说，它是根据美国的政治传统试图给克林顿的治国实践贴上的政治标签。^[2]

我们今年下半年以来在国内外报刊上经常见到的“克林顿主义”(Clinton Doctrine)一词，又不同于以往所说的“克林顿主义”。最近频繁被提及的“克林顿主义”，很少触及其国内政策，而集中讨论克林顿由美国处理科索沃危机中得出的对外政策原则，其核心是所说的“新干涉主义”。这是在外国的“克林顿主义”。此“克林顿主义”在对外政策上提出的一些主张，与克林顿几年前的做法有不同甚至相反之处。因此，我们不妨称之为新“克林顿主义”。

新“克林顿主义”是以今年初夏到初秋克林顿在欧洲和联合国的三次讲话作为标志提出的。6月，克林顿在科索沃战争后的“胜利之旅”中到达阿族难民营。他说，北约空袭南联盟是为制止种族清洗而进行的军事干预，是一场正义的、合法的战争，这种军事干预应得到不仅是美国、北约的支持，而且还需要世界上其他大国的支持，尤其是联合国的道义支持。^[3]后来，他在马其顿对北约军队再次说，“如果有人出于种族、民族背景或是宗教的原因追赶无辜的平民，试图对他们进行集体屠杀，而我们又有能力予以制止，这时我们可以向全世界人民——不管是在非洲、中欧或是其他地方——声明，我们将制止这种行动。”^[4]9月，在联大，克林顿再次表达了类似的主张。新“克林顿主义”有三点引人注目：其一，它一改克林顿执政初期在卷入地区冲突上（如波黑）较为温和、甚至消极的态度，采取以武力积极介入的姿态；其二，它甚至没有以涉及美国重大的安全、经济利益为条件，而把人道主义作为理由，这较以往大大扩展了干预的范围；其三，它仍把干预局限在“能力”范围内，即不超出美

国国内可以容忍的政治、军事代价。

克林顿此言一出，美国内外议论纷纷。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虽然不尽同意克林顿的言辞，但对其新干预主义持基本赞同的态度。一向颇具独立姿态的法国也起而应和。若斯潘说：“国家的暴力已经挑起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必须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通过国际社会来维护进行干预的原则，为受害者带来宽慰。”^[5]一些发展中国家则疑虑重重。代表非统在联大发言的阿尔及利亚总统说：“我们对任何危及我们主权的行为仍然极为敏感，这不仅是因为主权是我们对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制度的最后防线，而且因为我们没有参加联合国的决策过程，也没有参与监督决策实施的过程。”^[6]此番言语之中不仅点出了干预的威胁，更给其公正性划上了问号。美国国内的舆论也不一致，有人叫好，有人担心。就是担心者原因也各不相同，从概念和理论根基上质疑者有之，从可行性上质疑者也有之。

新“克林顿主义”探源

克林顿为什么试图把对科索沃的干预经验加以推广？它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首先，新“克林顿主义”的推出说明西方进一步出现了把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从“主权国家”转向“人”这一倾向。传统的外交实践立足于主权国家，把人视为主权国家的附属物。这与西方自由主义存在冲突。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与其公民是契约关系，国家的“合法性”以公民同意为基础，个人的福利和自由是民主国家的政策出发点。冷战的结束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不仅是自由民主观念的胜利，还搬去了推进其价值观念的阻碍，因此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回潮。“人权高于主权”论、“民主和平论”在学界、政界颇成气候。以安全研究为例，以往的国际安全研究主题一般以国家为单位，现在国际安

全研究出现了“人的安全”这一概念。而在国际干预方面，主张破除“过时的”不干涉原则，积极进行干预的声音也渐增大。^[7]在美国，各种人权活动组织试图积极向政府施压，影响外交政策。新“克林顿主义”以此为背景，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用干涉去打破那些侵犯人权的国家的主权，自然能在国内赢得部分舆论支持。美军在索马里的失败曾给理想主义者当头一棒，而科索沃的暂时胜利则给克林顿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以全面树立其经济、安全、民主三大对外政策支柱，推进“扩展战略”。一旦新“克林顿主义”得到承认，美国可借此在国际上树立又一个自己主导的行为规则，从而把“人权高于主权”落到实处。

其次，新“克林顿主义”的出台也体现了克林顿日渐成熟的“新民主党人”的思想，是“第三条道路”在对外政策中的体现。“传统的左翼主张外交政策应体现美的道德价值观，但通常不赞成穷兵黩武；右翼在外交上很强硬，但坚持美只有在生死攸关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胁时才进行干涉。”^[8]克林顿将这两种主张合而为一，以右翼的手段达到左翼的目的。他抛开联合国，在科索沃危机中坚持向塞族施压，并不惜大量使用武力，体现了传统保守派的做法；另一方面，科索沃不是涉及美国重大利益的地区，美国是以人权为理由介入的，这又体现了传统自由派的初衷。联系到克林顿在其它外交事务上的做法，美国对外政策的这一信号值得注意。比如在贸易政策上，克林顿政府一方面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和多边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又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动辄实施经济制裁。在海地和科索沃，克林顿则推行“枪口下的民主”。克林顿就任总统后，一度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和外交调解，在国内削减军费；在其第二任期，他似乎更重视联盟的作用和武力威胁，并大举增加军费。这些变化，进一步打破了过去美国对外政策上传统的“左派”和

“右派”、“鸽派”和“鹰派”壁垒分明的情况。

第三，克林顿此时提出新“克林顿主义”也有国内政治和个人实用主义的一面。新“克林顿主义”包含理想主义不等于克林顿本人是理想主义者。尽管克林顿可能深受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但是他的施政经历说明他是一个折中主义者、实用主义者。虽然克林顿在诸多经济社会问题上成绩可嘉，但共和党人抓住克林顿个人以及民主党政府的各种“丑闻”，穷追猛打。在距离任不满两年的时候，克林顿“跛脚”已现，在国内政策上难再有建树。而在对外政策上，对俄和对华政策短时期不可能取得突破，如果克林顿能借科索沃之战的“东风”留下一个为下世纪的美国外交奠定基调的“主义”，就可以在历史上为自己书上一笔。尽管个人因素对新“克林顿主义”出台的影响不宜夸大，但也不应忽视。

第四，90年代的国际环境和力量对比为克林顿干预政策的推行提供了可能。简单地说：其一，美国力量膨胀，“一超”地位确立，对外军事干预有了后盾；其二，干预政策基本取得了主要盟友的支持；其三，国际上美国没有明确对手，缺少有效的制衡；其四，民族、种族等冲突增多，为西方的干预提供了机会。总的来说，美国进行对外干预的环境改“善”、能力上升、意愿增强。

我们说新“克林顿主义”是试图以人道主义为理由而进行干预的主张，这是其与旧干涉主义不同之处。那么，此“克林顿主义”到底是一项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还是仅仅披着人道主义的外衣而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笔者认为，一项现实中的外交政策总是综合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想法。支持或反对一项对外政策的人可能出于纯粹的理想或利益考虑，但制订和执行对外政策的人总是会用两方面的理由证实自己政策的合理性。所以，做偏重理想和偏重利益的分析，好于做把理想和利益对立起来的分析。而且，

理想主义的对外政策永远不应该指只符合理想而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而应指既包含理想又包含利益的政策。现实主义的政策应被视为为了利益降低甚至背弃理想的政策。哈佛尔说，北约是纯粹出于道义而非利益发动了科索沃之战。^[9]——那是假话。纯粹理想主义的对外政策是不存在的，“威尔逊主义”不是“乌托邦主义”。不过，如果美国象在冷战时期一样为了对抗敌手去帮助恢复一个独裁政权，那可能是赤裸裸的出于美国利益的政策。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确不认为科索沃是对美国利益生死攸关的地方，所以新“克林顿主义”应被视为颇具理想色彩。传统现实主义的代 表凯南和基辛格都批评克林顿的主张过于“道德理想”就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10]如果世界上的每一项对外政策都是出于不包含理想而只包含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那战争的数量可能会更少。这只能说明有些战争是理想或价值观念的冲突促发的。这些“理想的”战争当然也包含了利益，有时理想本身甚至就是一项重要的利益。有人说，如果克林顿出于人道主义都可以进行干涉，那他更会出于美国的利益进行干涉。不错。但笔者认为，依据定义，重在 美国的经济、安全利益而进行的干涉不应被归入新“克林顿主义”的一类。

尽管本文认为新“克林顿主义”从国际关系理论上应被归为理想主义，但从人权、民主出发的“克林顿主义”却包含了这样一个悖论：它用非民主的、侵犯人权的手段去推广民主、维护人权。战争造成新的流血、难民、仇恨。这样一个新“克林顿主义”不仅从实施手段上霸气十足，而且在本质上也是单向的：虽然从逻辑上，干预的对象是普遍的，但西方报刊承认，他们几乎不用担心由于这一原则的扩展而由别人干预自己的内部事务。^[11]这实际上只是由西方去认定所谓的“人道主义灾难”并予以干预，是以霸权推广人权。

美国外交中的人权与干预

新“克林顿主义”的关键词是“人权”（或人道主义^[12]）和“干预”。现在，我们不妨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看，这两个词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之上的，又经历了近代文艺复兴，以个人自由、人权、法治为特点。陈乐民先生曾说，“基督教文明从来就自认为负有教化非基督教民族的‘使命’，从十字军东征到传教士的遍布天下，都说明了这种世界文明观。这种历史文化的基因经过欧洲中心主义的冶炼，深深渗透进西方政治文化的血管里，及至帝国主义扩张时期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这种必欲对其它地区施行‘教化’的心理就变成了政策……”^[13]此语尤其适用于美国。美国自诞生之日起，其对外关系就充满了“道义”的内容。推动早期美国外交的两个轮子，一个是商业，另一个就是传教。特别是经历了19世纪，美国基本完成了内部整合、登上世界舞台之后，其干预的触角开始伸向世界各地。美国人不仅要通过干预满足其传教士式的使命感，还要通过干预确立其领导地位。这是美国对外干预融合理想和现实利益的突出特点。它要“先当西方国家的领袖，建立以它为主的集体干预体制，然后关注和插足世界其他地区的事情——从政治到经济，从全球安全到热点地区，从美洲的海地到亚洲的柬埔寨、阿富汗，从欧洲东部的前南斯拉夫到非洲索马里和卢旺达，从中东到朝鲜半岛……无论是否直接涉及美国利益，它都认为有责任亲自去管，或通过国际安排拉住欧洲国家分担责任。至于它管得了管不了，那是次要的；首要的是它要管。”^[14]

但是，因为“人道”或“人权”而进行干预的思想在西方包括美国的“干预”实践

中几乎从未成为主流。“梅特涅体系”所进行的干预是以所谓“正统”原则去压制欧洲的民族民主主义；帝国主义曾对殖民地进行的大量武装干涉不是为了保护人权、弘扬人道主义，而是为维护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而破坏了人权、引发了人道主义悲剧。这使那些弱小的国家对西方的干预“提心吊胆”。就是自以为对外政策以“理想”、“道义”“见长”的美国，在回顾自己的干预历史时，也只能脸红而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威尔逊主义”包含的理想色彩在二、三十年代没有落到实处反而受到了孤立主义者的有力制约；肯尼迪总统虽曾把“人权”挂在嘴边但还谈不上实施“人权外交”；尼克松更是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促进人权和民主成为了现实主义的外交大师。民主党的卡特总统虽然开辟了“人权外交”的新纪元，却备受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和国内政治保守派批评，屡遭挫折。^[15]摩根索就曾质问美国是否有权把自己的人权思想运用到他国，并批评这样的干预未将抽象原则和国家利益区分清楚。^[16]冷战时期美国在国外进行的干预（以艾森豪威尔主义、卡特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难以摆脱和苏联对抗的影子，其动机自然无法锁定在“人权”和“人道主义”上。相反，美国却曾经出于反共的考虑在拉美、非洲进行过干预，从而与一些反人权、反人道的政权站在一起。这种人权/人道主义与干预“分家”的情况自然受到理想主义者的批评。

冷战的结束为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干预的理由和条件）提供了新的背景。苏联作为抗衡因素不存在了，“道义原则”本身也似乎可以足够作为干预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克林顿接过了卡特的旗帜并企图发扬光大。但是，这些并不表明美国出于“人道主义”的对外干预就没有了阻力。外部的不说，内部保守派就高举“鲍威尔主义”，强调只有在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受到威胁、而且必须要在动用大批压倒性优势兵力确保胜利的前提

下，美国才应予以直接干预。^[17]

美国的外交史说明，以人权、民主、人道等为出发点的道义考虑是持续影响其对外政策的因素之一。新“克林顿主义”不是凭空跳出来的。美国人推广其价值观念的“救世”冲动和领导世界的冲动由来已久。即使今天克林顿不提出一个“主义”，明天也会有别人提出类似的“主义”。这是新“克林顿主义”的生存基础。但是，以“人权”和“人道主义”为理由进行的干预，总是遇到保守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实际情况是，在国家利益与人权/人道主义出现对立的时候，后者经常让位于前者；而在人权/人道主义与国家利益可以统一时，推行人权外交和人道主义干预就相对顺利。相信这一“规律”对克林顿及其继任者也不例外。

新“克林顿主义”的走向

克林顿今年以来提出的以人道主义干预为核心的对外政策主张，尚不能作为系统的支配美国外交的理论，其走向仍值得继续探讨。新“克林顿主义”也需进一步明晰。

无论在美国内外，对新“克林顿主义”干预的理由和范围都存在争议。国内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出于人道主义进行海外干预是让美国士兵在国家利益没有受到重大威胁的情况下“冒险犯难，身履险境”，“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可能卷入世界各地的内战之中”，把“美国军队与世界边远地区令人怀疑的人道主义运动拴在一起”，这是昏了头脑的理想主义。^[18]俄罗斯人和一些欧洲盟友担心，克林顿要保证授权美国军队成为国际警察。就是在克林顿政府内部发出的声音也不一致。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等纷纷出来为克林顿的“主义”做“注脚”。伯杰认为干预必须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盟国必须支持，而且干预必须发挥作用。他说：“美国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去帮助每一个受

受害者，而且也难以达成共识。”这和克林顿的讲话传达的信息显然不同。奥尔布赖特提醒：不要过分夸大北约进行的科索沃战争与在其他情况下打击少数民族清洗运动和灭绝种族行为之间的类似之处。^[19]

新“克林顿主义”的可行性也受到了质疑。一些共和党人指责克林顿浪费美国有限的军事资源，将影响美国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能力。索马里给克林顿提供了反面的教训：一旦美军在干涉中出现较大伤亡，公众是否还会支持？而且，如果推广科索沃的经验，那么美国是否要干预苏丹？印度尼西亚？卢旺达……？对于北约成员的土耳其压制库尔德人的行动怎么办？对于核大国俄罗斯在车臣阻止分离主义的行动怎么办？如果为美国要进行的干预加上各种条件，那“克林顿主义”还有什么意义？理查德·哈斯说，按照克林顿的想法可能会出现如此之多的符合“克林顿主义”的国家，因此这种主义也就毫无用处。^[20]新“克林顿主义”面临的问题说明它仍需要进一步自圆其说以赢得国内外的政治支持。如果不能对上述疑问作出回答，克林顿就难免被指称为企图以此扬名，而其“主义”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

实际上，美国报刊已经为按照新“克林顿主义”进行的干预归纳了条件。从这些条件中可以看出美国今后进行干涉的走向^[21]：

- a. 内战、分离主义运动、民族冲突或跨境战斗升级为足以引起世界关注的暴力行动；
- b. 冲突发生在前苏联和中国领土以外或与之接壤的地区以外；
- c. 军事专家认为保证最低限度人员伤亡的小规模动武可以在减少暴力方面发挥重大影响；
- d. 盟国之间有协议，美国不必单独采取行动；
- e. 危机的周边国家没有维和部队或力

量不足时。

上述条件说明，美国人将来也不太可能贸然以“人道主义”为借口进行单独干预，这种干涉将多采取以美国为首但由盟国分担的形式，以避免冲突升级为大国间战争和保持最小伤亡。而且，干预将有助于美国的其它利益或至少不与之冲突。

结 语

新“克林顿主义”体现了美国外交中的道义思想，又打上了克林顿本人“新民主党人”的烙印。它是在美国没有了大敌的情况下针对混乱的世界提出的一个粗略的应对原则。冷战的结束，为美国提供了把道德理想与现实利益结合起来的契机，克林顿的干预主张就是一次这样的努力。新“克林顿主义”试图在对外事务中继续保持美国作为规则制订者的地位和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又贯彻了“人权”、“民主”的思想，因而在美国国内会受到左翼和右翼中间派的喝彩，但也会受到极端派的怀疑和批评。新“克林顿主义”试图通过打破主权维护人权、依靠霸权施行人道，所以定会引起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疑虑或反对。这个“主义”能否长久，关键取决于它能否在实践中把美国倡导的人权、人道主义与其安全、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

注释：

[1] 参见：Joshua Muravchik: Clintonism Abroad, *Commentary*, Feb. 1995, V. 99, No. 2, p. 36 (5).

[2] 参见：Clintonism, (cover story)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an. 26, 1998; 另见：Reactivated: What the new Clintonism really means, *The New Republic*, Feb. 9, 1998, V. 218, No. 32, p. 23 (3).

(下转第 72 页)

综合国力在世界上还没有达到我们作为一个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所应达到的地位,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中国具有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历史,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有新中国外交五十年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我们的文化背景。中国不同于西方,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科建设理应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特色之路来,这不仅仅是“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每个国际政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 [1]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 页。
- [2] (美)亨利·基辛格著:《大外交》,海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 页。
- [3] 同注 [2]。
- [4] 颜声毅主编:《当代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5—366 页。

(上接第 98 页)

- [3] 参见:丁胜:“新‘克林顿主义’评析”,《现代国际关系》1999 年 8 期,第 12 页。
- [4] 路透社 1999 年 9 月 10 日电。《参考资料》1999 年 9 月 14 日。
- [5] 参见:“关于新帝国主义的辩论”,(英)《情报文摘》1999 年 9 月 24 日。《参考资料》1999 年 9 月 30 日。
- [6] 同上。
- [7] 参见 Michael Glennon: *The New Interventionism,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9, pp. 2-7.
- [8] 杨永红:“美国霸权主义的新发展”,《国际问题研究》1999 年第 3 期,第 6 页。
- [9] 参见《波士顿环球报》1999 年 7 月 5 日。《参考资料》1999 年 7 月 9 日。
- [10] 同上,另参见:“凯南的忠告”,《华盛顿邮报》1999 年 8 月 3 日。《参考资料》1999 年 8 月 6 日。
- [11] 同注 [5]。
- [12] 在此,我们应该区分“人权”和“人道主义”,两者并非同义词,但有一定联系:人道主义问题可能是由破坏人权的事情造成的,但不是所有的人权问题都造成人道

主义灾难,也不是所有的人道主义灾难都源于人权问题。“克林顿主义”主要针对的是西方所谓的由种族冲突或国家暴力侵犯人权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

- [13] 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 页。
- [14] 同上,第 48 页。
- [15] 参见:刘金质:《美国国家战略》,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90~304 页。
- [16] 参见王缉思:“摩根索理论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中美文化研究》1989 年第 1 期。
- [17] 《芝加哥论坛报》1999 年 9 月 22 日。《参考资料》1999 年 9 月 27 日。
- [18] 埃得温·福伊尔纳:“枪口威迫下的民主”,(美)传统基金会网站。《参考资料》1999 年 8 月 17 日。
- [19] 参见《华尔街日报》1999 年 8 月 6 日,《参考资料》8 月 9 日。《华盛顿时报》1999 年 6 月 22 日。
- [20] 《华尔街日报》1999 年 8 月 6 日,《参考资料》8 月 9 日。
- [21] 同注 [15]